

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机会结构、 水平网络与架构共鸣*

周 明 曾向红

提要: 本文源于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埃及 2005 年与 2011 年发生的两次致力于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为什么会带来不同的政治效应? 本文以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分析发现, 这两次社会运动在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的水平网络方面没有明显区别, 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运动架构产生的共鸣程度不同。这种差异进而影响到动员能力, 最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

关键词: 政治机遇 水平网络 架构共鸣 埃及 社会运动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10 年年底开始, 一股政治剧变的浪潮席卷北非中东地区, 至今未息。肇始于突尼斯的政治剧变迅速蔓延到埃及、也门、巴林、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等国家, 导致突尼斯与埃及总统先后辞职下台, 利比亚局势随卡扎菲的死亡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其他国家的政治局势虽发生剧变, 但前景依然不明朗。^①关于此次北非中东政治剧变的性质,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但可以确定的是, 就影响而言, 这波政治剧变将不仅对这些发生政治剧变国家的政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Doran 2011; Shehata, 2011; Hamid, 2011; Boukhars, 2011), 而且将极大地关系到整个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美国、中国等大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王锁劳, 2011; 孙溯源, 2011; 牛新春, 2011; 杨阳, 2011; Lynch, 2011;

*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为 11YJCGJW022) 的资助。作者在此感谢《社会学研究》的匿名评审专家以及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杨恕教授、丁志刚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章的错漏之处由笔者承担。

① 据统计, 阿拉伯联盟 22 个成员国中的 16 个国家已经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抗议活动 (Fakhro & Hokayem, 2011: 22)。

Joshi ,2011; Freeman ,2011 ,Sky ,2011; Byman ,2011a ,2011b) 。至于此次剧变的原因 ,学者们已经指出了这些国家共有的一些特征:在经济领域 ,经济结构的单一和经济自由化政策 ,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 ,令各国居民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物价飞涨 ,构成群众反抗政府的主要原因;在政治领域 ,北非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长期执政及衍生的官场腐败、裙带关系现象 ,严重削弱了各国政府的合法性(贺文萍 2011; 张维为 2011; 秦天 2011; Goldston ,2011; Taleb & Blyth ,2011; Ismail & Adly ,2011; Sharekh ,2011; Johnstone & Mazo ,2011) 。此外 ,该地区年轻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网站在社会抗议中的动员作用、“全球化陷阱”带来的问题、北非中东国家发展模式的积弊、这些国家采取的外交政策等 ,都被视为此次北非中东剧变的解释因素(田文林 2011; 乐颖 2011; 秦天 2011) 。

本文拟集中研究埃及的政治抗议活动。我们将埃及2011年的政治抗议活动(下称“一二五”,因为1月25日埃及政治剧变的序幕正式拉开)与该自2004年底一直延续到2007年的“受够了”(阿拉伯语“Kifaya”或“Kefaya”,翻译为英文是“Enough”)运动进行比较,而且将这种比较纳入到社会运动理论的框架中来进行。从其发展过程及后果来看,它们符合社会运动的主要特征,即有政治抗争、发起了集体行动、有比较明确的政治诉求(蒂利、塔罗 2010:9)。事实上,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许多运用社会运动理论来解释北非中东地区政治发展过程的尝试,其中就包括了对“受够了”运动的解释(Bayat ,2005 2007; Clark ,2004a ,2004b; Munson ,2001; Wickham ,2002; Wiktorowicz ,2001 ,2004a; Mednicoff ,2003; 倪云鸽、胡雨 2009; 胡雨 2009)。考虑到“受够了”运动发起抗议活动最多的是在2005年,本文集中研究“受够了”运动在2005年的活动情况。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做一简要介绍,然后分别讨论政治机会结构、动员资源(包括反对派联盟、社会支持网络与虚拟社交网络)、社会运动架构等能否解释这一困惑,最后概括本文的发现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简介

“受够了”运动在埃及社会运动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受够了”运

动兴起于 2004 年春季,2005 年达到高潮,2007 年后半年逐渐衰落。“受够了”运动的导火索是 2005 年 9 月举行的埃及总统大选。当时,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试图继续第六个总统任期,^①并且有迹象显示,穆巴拉克有意效仿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进行家族统治,致力于将总统之位传给其次子贾姆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②穆巴拉克的这些举动,让饱受失业、物价飞涨、警察与安全机构人员飞扬跋扈之苦的年轻人和某些政治力量极为不满。在此背景下,2004 年下半年有数百名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汇集在一起讨论埃及的政治形势,其中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埃及行政机构权力过大的问题。在收集了近 300 名著名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者的签字之后,活动分子于 2004 年 9 月 22 日召开了一次会议。该会议有近 500 人参加,并成立了“埃及变革运动”(Egypt Campaign for Change)组织作为发起抗议活动的协调机构。因为在反对穆巴拉克当局的过程中喊出了“受够了”的口号,“受够了”运动因此而得名(为了表示区别,我们把这次社会运动仍称为“受够了”运动,对其组织仍称“埃及变革运动”组织)(Oweidat et al., 2008: 10; El-Mahdi, 2009: 1018)。

“受够了”运动是埃及自 1977 年发生“面包骚乱”以来的第一次民主运动,它通过静坐、示威游行等方式传达政治信息。在 2004 年“受够了运动”兴起之前,埃及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一次是 2000 年由“全民变革运动”(Popular Campaign for Change)组织领导的声援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抗议,以及 2003 年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尽管这两次抗议活动因为埃及政府的镇压而失败,而且主要针对的是埃及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它们最终都将抗议的矛头指向了穆巴拉克政府的统治。在吸收了前两次运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受够了”运动明确喊出了“受够了”的政治口号,并传达出“不要第五个总统任期、不要家族继承”的信息。终结穆巴拉克的统治和进行自由、民主的总统选举,构成了“受够了”运动的首要政治诉求(El-Mahdi, 2009: 1013; Oweidat et al., 2008: 17)。通过提出明确的政治

① 穆巴拉克分别于 1981、1987、1993、1999、2005 年当选为埃及总统,2011 年的“一二五”运动终结了其继续第六个总统任期的抱负。

② 贾姆勒子承父业的迹象早在 2000 年就有显示。当时,贾姆勒被任命为埃及执政党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也被译为“民族民主党”)的政策总书记,这是一个为贾姆勒量身打造的新职位。到了 2005 年,贾姆勒已成为埃及国家民主党的重要决策人物。

口号、组建松散的社会运动联盟、组织静坐和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受够了”运动展示了较强的动员能力。该运动吸引了埃及不同政党和各种专业组织参加，还动员了农民、法官、工人、妇女等群体举行抗议活动(Wolff, 2009; Faris, 2010: 109 - 115)。在其顶峰时期，“埃及变革运动”组织在埃及 26 个省的 24 个中有自己的代表机构。“受够了”运动在 2005 年 5 月至 12 月间组织的主要抗议活动见表 1。

“受够了”运动希望迫使穆巴拉克下台和推进民主的目标未能实现，但它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受够了”运动的评价呈现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该运动的领导人和某些研究者认为 2005 年 5 月 11 日穆巴拉克政府对宪法第 76 款进行修正，允许埃及进行多位候选人竞选总统，主要得益于该组织发起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不仅如此，“受够了”运动的兴起，显示了埃及政治力量有权进行抗议与组织示威活动，从而在埃及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模式(Shorbagy, 2007a: 39 - 60)。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穆巴拉克政府之所以修改宪法条款，主要是因为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和权力斗争；至于民众的抗议与示威权利，只在运动早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现和维护，后来由于内外部原因，“受够了”运动日趋式微，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El-Mahdi, 2009: 1026 - 1027)。后一种评价显然低估了“受够了”运动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受够了”运动能够在埃及这样一个军警和安全力量随处可见、政治自由有限、自 1981 年就开始实施戒严法的威权主义国家中发起一系列挑战当局的政治抗议运动，实属不易。诚如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受够了’运动领导人自认为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克服了直接对抗政府政策存在的诸多障碍。在‘受够了’运动兴起之前，活动分子因为害怕遭到镇压，从不敢向权力象征、穆巴拉克总统、穆氏之子说‘不’；而在‘受够了’运动兴起之后，‘我们能够对穆巴拉克说‘不，我们已经永远不再需要你了；我们不再需要你的儿子；我们不需要一个继承性的王朝’”(Oweidat et al., 2008: 24)。

“受够了”运动标志着在埃及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可以说，“受够了”运动在埃及开创了一个先例，当人们对国家政策和现实问题有所不满时，倾向于通过抗议活动来表达不满，而且这种行为具有明确的政治取向。而当民众的要求以静坐、游行示威、群众集会等方式得以表达时，各种抗议活动就具备了影响国家政策和政治发展方向的潜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型潜力囊括了广泛的政治力量，对于埃

表 1 埃及 2005 年由“受够了”运动及其同盟组织的抗议活动(2005 年 5 - 12 月)

时间	事件
5. 25	反对宪法第 76 款全民公投的抗议
6. 1	由“埃及母亲协会”组织的黑人妇女反对安全机构迫害的抗议
6. 8	在达利赫·萨阿德(Dareeh Saad ,1919 年革命领导人) 的墓地举行的烛光守夜
6. 9	“推进妇女民主”组织发起的捍卫妇女政治权力的抗议
6. 15	“青年变革”组织与博主们在萨伊达·宰那卜(Al-Sayedra Zeinab) 陵墓前的示威游行
6. 22	“全民变革运动”在“现在就要自由”口号下于开罗舒卜拉区(Shubra) 组织的示威游行
6. 26	在埃及内务部前组织的示威游行 庆祝国际反虐待日
6. 29	在泽桐(Zeiton ,开罗附近的一个镇) 的圣母玛丽亚教堂组织的抗议
7. 14	“受够了”运动在阿博丁宫(Abdeen) 广场组织的失业抗议
7. 20	“全国变革与改革联盟”组织的有 5000 名抗议者参与的抗议活动 ,声援法官抗议活动
7. 31	抗议总统选举
8. 1	在埃及总检察院办公室、埃及最高法院、媒体联盟大楼前的静坐示威 ,要求释放 7 月 31 日被逮捕的抗议者
8. 2	“作家与艺术家变革”组织在开罗香草大道(Talaat Harb) 街头举行抗议
8. 3	在大剧院广场(Opera Square) 举行的反腐败抗议
8. 8	在医生联合大楼前举行的抗议 ,要求释放被捕的医生
8. 14	“全国变革与改革联盟”组织的有 7000 人参与的抗议活动 ,号召“对当局说不 ,对司法独立说是”
8. 16	“全民监督选举运动”宣布发起“我们都在看着你”运动
8. 21	“青年变革运动”制作了长达 30 分钟、以抗议为主题的视频短片 ,并在人口密集但收入水平低下的吉萨省(Giza) 尼赫亚村(Nihia) 散发
8. 26	“青年变革运动”在罗德·法拉杰(Rod el Farag) 街区组织的抗议活动 ,散发了数千份传单 ,传单上印有抗议者的博客网址
9. 1	“全国变革与改革联盟”发动集会 ,支持司法独立与终结腐败
9. 8	由本尼·苏耶夫(Beni Suef) 剧院大火受害者朋友与家属组成的“9 月 5 日团体”在国家举行的葬礼上进行抗议 ,要求对导致超过 30 名艺术家丧生的大火原因进行调查
9. 27	由“受够了”运动、博主、“9 月 5 日团体”与被捕人家属组织的示威游行
12. 12	“受够了”运动抗议新选举的议会议员 标志着“受够了”运动兴起一周年

资料来源: Fahmi 2009: 98。

及来说恰逢其时。从长期来看,这种实时性的跨意识形态力量,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潮流和一种新的运动类型,从而在埃及催生一种有希望的政治形式”(Shorbagy, 2007b: 175)。现在看来,“受够了”运动构成了2005年及以后各种政治抗议活动出现的催化剂。在2005年至2011年间,埃及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如2006年反对黎巴嫩战争的抗议、2006年抗议安全机构对妇女的性侵犯、2007年反对封锁加沙地带的抗议、2008年4月与2009年4月掀起的“4·6大罢工”等等(Faris, 2010; Beinín, 2009: 449-454)。可以说,“一二五”运动是“受够了”运动的延续,这不仅是因为“受够了”运动分子积极参与了“一二五”运动,更重要的是,后者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一二五”运动之所以能达成目标,与其组织者和参加者从“受够了”运动中汲取了经验教训有一定关系。当然,“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是相对独立的,前者在2007年就已衰落也是学界的共识,因此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受够了”运动虽然没有实现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目标,但它毕竟拉开了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序幕。就此而言,“受够了”运动是成功的。至于本文将“受够了”运动在2005年的活动视为失败,主要是基于它未能实现推翻穆巴拉克统治这一预期目标而言的。

“一二五”运动终结了穆巴拉克政府统治。“一二五”运动的种子早在2010年6月就已埋下。2010年6月6日,埃及亚历山大城28岁的小贩哈利德·赛伊德(Khaled Said)被两名便衣警察殴打致死,成为“一二五”运动爆发的远程导火索。根据埃及警方的说法,赛伊德是在吸食毒品时发生窒息;而据人权组织的说法,赛伊德是因为拍摄了官员拥有非法毒品的视频(此视频后来被上传到YouTube网站上)而死。在他死后的第五天即2010年6月11日,一位匿名的人权主义者申请了一个“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伊德”的Facebook账号,上传了停尸房里赛伊德血迹斑斑、浑身伤痕的尸体照片,同时转载了他在YouTube网站上的生活视频。这种视觉上的强烈反差和对警察腐败、滥用暴力的宣传,让许多Facebook用户对赛伊德及其遭遇深表同情,同时对埃及警方的腐败愈发愤怒。至2010年6月中旬,已有13万网民点击了该网页;到了6月底,该网页已有50万的点击率(Jennifer, 2011)。

网民们利用赛伊德事件展开了政治动员。网民们不仅密切跟踪赛伊德一案的最新进展,而且还利用Facebook、Twitter、Myspace等社交网站进行政治动员。他们呼吁民众在开罗与亚历山大城等城市进行抗

议,这些抗议活动后来蔓延到埃及的其他9个城市。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埃及法院于2010年7月上旬逮捕了与赛伊德死亡有关的两名警员。然而,直到穆巴拉克于2011年2月11日宣布辞职,该案仍然没有了结,加上埃及警察虐待平民的事件时有发生,自2010年6月起,埃及的社会抗议活动就没有停止。一开始是每个星期都有抗议活动,不过到了2010年的秋季只是零星发生。但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强大的社会抗议浪潮面前出走,再次点燃了埃及群众尤其是网民和年轻人的抗议热情。1月25日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群众抗议事件。

“一二五运动”进行了18天,但它显示出的动员力量最终导致穆巴拉克于2月11日黯然下台。鉴于国内外媒体对“一二五”给予了大量报导,这里只对“一二五”运动的发展过程进行简要梳理(见表2)。值得指出的是,表2主要利用的是西方媒体的报导,而这种报导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即同情抗议者,忽视未参加抗议的绝大多数埃及人(包括穆巴拉克支持者)的观点,存在以偏概全、歪曲事实的情况。^①因此,表2只记录了“一二五”运动18天里的主要事件,而不进行评论。

埃及“受够了”运动的逐渐式微与“一二五”运动的成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极富研究价值的问题:为什么前者失败了而后者却达到了目的?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现有研究经常提及的政治腐败、经济困难、人口结构、网络动员、其他国家的运动带来的示范效应等解释因素,都不足以说明这两次社会运动为什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它们在动员能力上的差异,而这是由社会运动在架构共鸣程度上的差异决定的。在此,我们运用社会运动理论来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

三、为什么不是政治机会结构?

社会运动理论主要探讨的是有助于社会运动取得成功的机制与过

^① 最为典型地体现西方媒体有倾向性地呈现事实的例子是将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有意无意地刻画成暴徒、安全机构人员,或是出于物质力量才支持穆巴拉克的。对于西方媒体所扮演角色的批评见 Macintyre, 2011: 6。

表2 埃及“一二五”运动的发展过程(2011年1月25日-2月11日)

时间	事件
1.25	在埃及全国各地爆发了要求穆巴拉克辞职的抗议活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讲话,认为埃及政府是稳定的,而且能有效应对民众的要求。这一天被称为“愤怒日”。
1.26	政府颁布禁止抗议的法令,警察用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约500名抗议者遭到逮捕。
1.27	巴拉迪回到开罗,随后在家中遭到逮捕;抗议继续,暴力升级;美国副总统拜登发表讲话称“我不认为穆巴拉克是独裁者”;穆斯林兄弟会呼吁其支持者上街声援抗议者。
1.28	埃及的因特网服务被切断;约10万名抗议者涌进开罗解放广场,抗议者焚烧了埃及执政党——国家民主党(又译为“民族民主党”)的总部;冲突进一步升级,至少有24名抗议者死亡,1000余人受伤,抗议者暂时撤离解放广场;穆巴拉克命令在全国实行宵禁,并将警察撤离解放广场,代之以军队,但抗议者欢呼军队的出现;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穆巴拉克与抗议者进行对话。
1.29	穆巴拉克自抗议活动爆发以来第一次露面,宣布解散内阁,任命情报机构负责人苏雷曼为副总统(此职位30年来一直空缺),但拒绝辞职;许多地方出现了抢劫活动,数百名囚犯越狱;埃及股票市场下跌至少18%。
1.30	奥巴马发表讲话,要求埃及进行“有秩序的转型”,以实现民主,但他没有要求穆巴拉克下台;抗议者重新涌进解放广场;巴拉迪呼吁穆巴拉克下台;埃及全国陷入完全的无秩序状态;军队是惟一的权威机构,保卫着中央银行、信息部、博物馆等重要机构与建筑。
1.31	穆巴拉克任命了新的内阁,军队总司令坦塔维被任命为副总理;军队拒绝向抗议者开枪,认为使用和平手段表达观点是得到法律保障的。
2.1	约25万抗议者(也有资料认为是100万)涌向解放广场,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包括亚力山大城、苏伊士城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穆巴拉克宣布不再参加预计于9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但拒绝辞职;针对穆氏的讲话,抗议者高呼“下台、下台”等口号。
2.2	抗议者与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至少3人被杀,600余人受伤;军队在冲突中保持中立,没有介入也没有终止冲突;巴拉迪、美国与联合国谴责暴力活动;因特网接入得到恢复。
2.3	抗议活动中约10人死亡,830余人受伤;总理沙菲齐宣布将对暴力活动进行调查;副总统苏雷曼宣布贾姆勒不会参与总统选举,并表达了与穆斯林兄弟会进行政治对话的意愿。
2.4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继续涌向解放广场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宣布当天为“离开日”;奥巴马向穆氏施压,要求后者采取具体步骤实现有秩序的转型,但仍然没有要求穆氏辞职;一些穆巴拉克政府高官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国防部长坦塔维来到解放广场,视察军队,呼吁和平。

续表 2

时间	事件
2.5	抗议者依然占领解放广场;穆巴拉克解除了其次子贾姆勒在国家民主党中的高级职位,要求其副手苏雷曼邀请反对党就政治改革问题进行谈判;另外,国家民主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也宣布辞职。
2.6	政府(以苏雷曼为代表)与反对党(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第一次进行谈判;反对派提出的穆巴拉克辞职的要求未被满足,谈判因此而破裂;但双方同意设定一个谈判路线图以研究宪法改革问题,抗议者继续要求穆氏辞职;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就是否应该谈判出现了分歧;10万左右的抗议者盘踞在解放广场;美国支持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谈判,认为埃及的命运应由埃及人自己决定。
2.7	新任命的埃及内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全国恢复正常状态;许多抗议者回到工作岗位,但仍有部分抗议者在解放广场坚守;开罗的股票市场仍处于关闭状态,但开罗的许多店铺重新营业;穆斯林兄弟会谴责政府不肯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美国谴责2月6日的谈判,认为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没有被邀与会。
2.8	谷歌公司执行官瓦伊勒·加尼姆(Wael Ghonim)在拘留12天后获释,他披露自己是“我们都是赛伊德”Facebook账号的创建者;加尼姆随即在电视台接受了采访,发表了极具情绪煽动性的讲话;当天,加尼姆还出现在解放广场,向抗议者表示“我不是英雄,你们才是英雄”,鼓励抗议者不用害怕政府、应该继续扩大抗议活动,抗议者重新获得了继续抗议的热情与勇气。
2.9	在面临各种压力的情况下,奥巴马呼吁埃及政府立即采取步骤推进民主转型;苏雷曼则警告说,在缺乏和平移交权力的情况下,埃及很有可能出现军事政变;苏伊士工人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大罢工,记者、邮递员、公交车司机、医生、钢铁工人等加入了罢工的行列;抗议者焚烧了许多政府建筑物与警察局。
2.10	中午,埃及开罗军区指挥官哈桑·罗伊尼(Hassan al-Roueihi)将军出现在解放广场并发表讲话,表示“你们的所有要求都将得到满足”;当晚,穆巴拉克发表讲话,宣布向苏雷曼移交部分权力,但他拒绝辞职;被情报机构的无能弄得极为尴尬的奥巴马认为穆氏的讲话不足信,采取的措施也不够。
2.11	100多万愤怒的群众在全国各地继续抗议;苏雷曼宣布穆巴拉克已辞职,并将权力移交给了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抗议者欢庆穆氏的出走和运动的胜利。

注:根据 Macintyre, 2011: 4; Dorell & Fordham, 2011: 1A; Reuters, 2011: A8; Fleishman, 2011: 1; Fisk, 2011: 2; Sharp, 2011: 2-11 的资料整理而成。

程。在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研究范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s Mobilization Theory)、政治过程模式(Political Process Model) 以及架构视角(Frame Perspective) (裴宜理、阎小骏 2006; 赵鼎新, 2006a, 2006b; 莫里斯、缪勒主编, 2002; McAdam, 1996)。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的是抗议者能够动员的各种资源,如资金、人员、政治力量、动员组织与动员网络,利用这些资源,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能够有效地将不满情绪转化为成功的政治行动(McCarthy & Zald, 1977)。而政治过程模式强调的是有利于社会运动出现的结构因素,这些结构因素往往被称为“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它强调的是抗议者与抗议对象(往往是各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对运动形式与运动结果所带来的影响(Meyer, 2004)。而架构视角强调的往往是抗议活动家为赋予抗议活动以合法性而建构起来的话语框架,这些话语框架因为会与抗议者所在的文化背景和抗议者本身的生活体验产生共鸣,所以能极大地扩大社会运动的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到社会运动的成败(Benford & Snow, 2000)。不同的理论家在运用社会运动理论来解释社会、政治现象时,往往强调的是不同理论范式的不同方面。由于社会运动理论主要是基于北美与西欧国家的经验而建立的,学界尤其是阿拉伯学者对于能否用以解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过程仍心存疑惑(Bayat, 2005)。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而且的确产生了许多有助于人们了解北非中东地区政治发展过程的机制,这种尝试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Haklai, 2009: 36 - 39; Tilly, 2004: xi)。下文我们将借鉴社会运动理论的这三种主流范式,来解释为什么“受够了”运动失败而“一二五”运动达到了目的。

首先可以看埃及这两次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政治机会。社会与政治运动不是在政治真空中发生的,外部环境能对社会运动的成败及社会运动本身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在外部环境中,政治机会结构的构成及其变化发展,被视为对社会运动发展构成重要影响的系列因素。根据社会运动理论家道格·麦克亚当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经典研究,政治机会结构的构成主要有四个方面: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精英内部的团结程度、是否有政治精英可以联盟、国家对抗议活动进行镇压

的意愿(MacAdam ,1996)。^① 考虑到麦克亚当政治机会结构模型的第二种与第三种因素有重叠之处,我们可以将后者并到前者中去,然后再增加一个因素,即“跨国环境与外部行为体的角色”(凯克、辛金克, 2005; Tarrow , 2005)。

在讨论这两次社会运动面临的政治机会是否存在重要差异之前,我们有必要澄清 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是否构成解释“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不同结果的决定性因素。现有的研究成果强调金融危机带来的高失业率和物价上涨对“一二五”运动出现具有重要影响,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金融危机并不是影响两次社会运动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统计数据表明,埃及 2011 年前的失业率与 2005 年前后的失业率相比,不仅没有高出许多,反而要低一些(见表 3)。尽管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但至少说明金融危机对埃及就业市场的冲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但全球金融危机对埃及民众生活的影响却是显著的,因为埃及消费品价格增长率在 2008 年后出现了较大增幅,这无疑会极大地激发群众的不满。不过,如果说物价上涨构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因素,那么我们就无法说明为什么“受够了”运动的衰落出现在 2007 年,以及在物价上涨最快的 2009 年埃及为什么没有出现超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我们由此判断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确对“一二五”运动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它不是“受够了”运动失败而“一二五”成功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表 3 埃及的失业率与消费品价格增长率(2003 - 2010 年)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失业率(%)	11. 275	10. 526	11. 468	10. 917	9. 205	8. 13	9. 00	9. 20
消费品价格增长率(%)	3. 2	8. 1	8. 8	4. 2	11. 0	11. 7	16. 2	11. 7

资料来源: Indexmundi , 201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2011: 193。

^① 麦克亚当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一概念的社会运动理论家,但他产生的影响最大。不同的社会运动理论家为麦克亚当的“政治机会结构”添加了不同的成分,到现在这一概念已经宽泛得可以往其中塞进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东西,以致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已大大下降(Gamson & Meyer , 1996; Meyer , 2004)。

接下来我们比较“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各自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在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与精英内部的团结程度这两方面,这两次社会运动面临的机会没有太大区别。首先来看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尽管埃及政府于2005年修改了宪法,允许多位候选人竞选总统,但自1981年萨达特总统被刺以来埃及戒严法的存在,以及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各主要反对派政党未能获得合法地位,均意味着埃及政府仍对政治自由进行严厉控制。因此2005年与2011年间,埃及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并没有明显不同。其次,就精英内部的团结程度而言,2005年“受够了”运动前后,埃及精英内部,尤其是埃及政府内部并未发生显而易见的分裂。2011年的“一二五”运动中,尽管在2011年2月4日及以后有部分政府官员加入到抗议活动中,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且这些人职位并不高(见表2),因此这些人士的“叛变”并未对穆巴拉克政府的团结构成严重威胁。事实上,埃及“一二五”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内部很少出现利比亚内战那样大批政府高官辞职或出逃的现象。至于在“可以联合的精英”方面,反对派和抗议者中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精英只有前国际原子能总干事长巴拉迪和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但这两人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尤其是巴拉迪,尽管被推举为反对派联盟领袖,但因为长达12年不在埃及生活,他的声望不足以抵消抗议者对他的不满。所以,2005年与2011年的这两次社会运动在精英联合上面临的机遇也无实质性的差别。

再来看“跨国环境与外部行为体的角色”。考虑到穆巴拉克政府是美国的长期盟友、美国在埃及有重要的战略利益,以及美国密切关注埃及局势的发展,所以在外部行为体中,对埃及社会运动发展趋势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美国的态度。在“一二五”运动中,美国对埃及抗议活动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政策,更多地只是被动地对埃及局势做出反应(Lynch, 2011)。这里不是否认包括奥巴马与希拉里有关埃及政府不能使用武力的表态对穆巴拉克带来的压力,不过奥巴马政府向埃及政府施加的压力并不比“受够了”运动兴起前后小布什政府要求穆巴拉克推进民主而施加的压力更大。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于2004年提出致力于在北非中东地区推进民主的“大中东计划”,以打造一个民主的新中东,埃及也在“大中东计划”之列(何志龙, 2006; 叶青, 2005; 王鸿刚, 2004; 邵峰, 2004; Leverett, 2005)。当埃及政府镇压“受够了”运动组织的抗议活动时,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因此取消了对埃及

的访问(Oweidat et al. ,2008: 13; Nicholas & Richter ,2011)。美国向穆巴拉克所施加的压力让后者极为恼火。维基解密档案披露 穆巴拉克 2008 年召见某美国高级官员时,曾就美国施加的政治改革压力向他抱怨了整整 90 分钟;不仅如此,穆巴拉克明确表达了对赖斯的不满,因为后者 2005 年在开罗发表了一场要求埃及推进民主的措辞强硬的讲话,让穆巴拉克极为愤怒(Nicholas & Richter ,2011)。这足以证明在受到美国施加的外部压力方面,两次社会运动也不存在太多的差别。

其他国家社会运动成功带来的示范效应,构成埃及社会运动“跨国环境与外部行为体角色”的另一因素。突尼斯抗议活动的成功是导致“一二五运动”出现的重要诱因,它激发了埃及抗议者和反对派挑战穆巴拉克政府的勇气和信心。不过,“受够了”运动同样受到了其他国家社会运动成功经验的影响。如“埃及变革运动”组织领导人承认,他们之所以通过动员民众采取和平抗议的方式挑战政府权威,就受到了东欧与中亚地区社会运动——尤其是 2003 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和 2004 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推翻政府经验的重要启发(Oweidat et al. ,2008: 14、20)。当然,由于地理位置、文化背景、政治状况、语言等方面的原因,突尼斯社会运动的成功对“一二五”运动带来的影响,无疑要比发生在前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对“受够了”运动产生的示范效应要大。然而,“示范效应”本身不会自动导致“一二五”运动取得成功。因此,导致“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成败的原因必须从其他方面进行分析。

埃及政府对两次社会运动进行镇压的意愿是否存在差别?无论是在“受够了”运动还是在“一二五”运动期间,埃及政府都表现出果断镇压抗议活动的意愿。在这两次社会运动中,埃及政府动用了防暴警察和安全部队对抗议活动分子进行逮捕、拘押,希望将社会运动压制下去。在这两次社会运动期间,社会运动参与者用手机、数码相机等媒体工具记录下了政府镇压抗议活动的大量照片和视频并上传到网络上,国际媒体也报导了大量的相关现象。然而,从社会运动中的冲突程度和人员伤亡数来判断,埃及政府针对“一二五”运动的镇压力度要比对“受够了”运动的镇压力度大。正是因为“一二五”运动中警察和安全部队在与抗议群众的对峙中出现了冲突升级和人员伤亡的情况,穆巴拉克政府才于 1 月 28 日调集军队替下警察和安全部队,这至少说明了政府试图严厉惩罚抗议者的意愿与决心。事实上,社会运动理论通

过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政府镇压的强度与社会运动能否成功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①如此一来,我们依然无法判断政府镇压在这两次社会运动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不过,埃及军队在“一二五”运动中所采取的中立态度是导致该社会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尽管不是直接原因)。但埃及为什么要动用政府军队、军队为什么在抗议活动中保持中立等问题,无法直接从政治机会结构模型中得到回答,否则会出现循环论证的问题。下文我们来看埃及社会运动所动员起来的资源能否对两次社会运动取得不同效果做出解释。

四、埃及社会运动进行资源动员的基础——水平网络

埃及两次社会运动中动员的资源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的是“组织基础、资源积累与集体协调对政治行动者们的重要性,突出社会运动与利益集团政治之间的相似性汇合倾向”。随着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进展,以前被研究者们忽视或低估的因素,如社会运动的偶然性、情感性、可塑性与互动性等内容也逐渐被纳入资源动员理论中(麦克亚当等,2006:19-20)。尽管注意到了许多可变和灵活的因素,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的仍是社会运动领导者在将抗议者、潜在支持者的怨恨、不满等情绪转化为街头抗议活动过程中所能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组织基础、集体协调、金钱、社会网络、网络技术等。

在埃及的“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实现动员的过程中,有三种资源发挥着尤为突出的作用:反对派联盟、各反对派赖以获得支持基础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博客、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我们可以将这三种资源统称为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水平网络,因为它们共

① 国家镇压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被称为“镇压与动员问题”(“repression-mobilization nexus”),它们之间存在何种因果关系,学界众说纷纭。有的观点认为镇压提高了社会运动的成本,从而增加其出现的难度(Snyder & Tilly, 1972; Hibbs, 1973; Oberschall, 1973; Oliver, 1980; Hardin, 1982; Boykoff, 2006; Cunningham, 2004)。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镇压增加了人们的怨恨,将激发更多的抗议活动,甚至使抗议趋向激进,乃至走上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的道路(Eckstein, 1965; Gamson et al., 1982; Goldstein, 1983; White, 1989)。还有的研究认为镇压既制约又激发了社会运动,其中的关键取决于镇压方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所在国的具体语境和国家采取的战略、策略(Khawaja, 1993; Davenport et al., 2005; della Porta & Reiter, 1998; Stanley, 1996; 黄冬娅, 2011)。

享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它们的组织结构至少从形式上看是以水平组织和协调为主,而不是以垂直和等级制作为构成原则。这是北非中东社会运动与欧美社会运动极为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Bayat, 2005; Abdelrahman, 2009; Singerman, 2004: 143 - 163; Wiktorowicz, 2004b: 22 - 26)。在埃及的“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中,这三种水平网络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构成它们具备一定动员能力的资源基础。换句话说,尽管动员起来的民众数量有别,但在动员资源方面,“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之间并未出现明显的区别,因此资源动员理论同样不能解释两次社会运动取得不同结果的现象。但考虑到“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毕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动员能力,从而有别于那些未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运动,因此我们仍需简要讨论这些水平网络的特征及其在这两次社会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首先看反对派联盟。“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都在反对派之间建立了跨党派联盟。“埃及变革运动”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汇聚了埃及不同政治倾向之政党的松散联盟,而且还是一个世俗性质的运动联盟。参与“受够了”运动的政治力量,囊括了纳赛尔主义分子(Al-Karama 党)、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子(社会主义革命组织)、自由主义分子(Al-Ghad 党)、伊斯兰主义分子(Al-Wasat 党与劳工党),以及另外一些比较著名的独立活动分子(El-Mahdi, 2009: 1013、1018 - 1019)。通过展示自身的动员能力,“受够了”运动不仅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而且还促使埃及影响最大、成员人数最多但不具合法政党地位的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于2005年3月29日正式参与到“受够了”运动中来(Lynch, 2011)。这些政党和组织之间缺乏正式的协调机制,它们的活动是在各政党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受够了”运动中反对派采取的是一种水平协商和协调的机制,各反对派参与社会运动时保持自身在组织和成员上的独立性(Fahmi, 2009: 96)。“一二五”运动期间,各反对派仍然延续了“受够了”运动期间建立反对派联盟的做法。参与过“受够了”运动的各反对派政党,包括穆斯林兄弟会都在“一二五”运动中重新联合了起来。它们在运动中协调行动、互相声援。这不仅反映在它们鼓励各自成员参与反对穆巴拉克政府的抗议活动,也反映在埃及副总统苏雷曼与反对派联盟之间的谈判过程中(Sharp, 2011: 5)。由于这两次社会运动都组建了跨党派联盟,而且其组成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跨党派联盟并

不构成前者失败而后者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看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一直受到社会运动研究者们的关注。社会支持网络最为突出的功能是为社会运动提供资源和支持者,另外还可以向社会运动贡献信息、威望、权力、合法性等资源,因此在社会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Avenim, 1978: 188 - 190)。不过,社会支持网络在社会运动初期阶段的作用尤为明显,因为它有助于向社会运动提供参与者和支持者。但与西方的社会运动主要通过垂直性的社会运动组织来进行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组织间的长期合作联盟甚至颇具规模的社会运动部门(social movement sector)不同(Bornstein, 2007; Leadbeater, 1996; Mair et al., 2006),北非中东地区国家由于政治开放的程度有限,垂直性的正式社会运动组织与享有较高团结程度的组织间联盟几乎不存在,即使偶尔会出现,其存在也是极为短暂的,而且仅限于能够有效取得共识的议题上(Diani, 2008: 14 - 15)。在此背景下,北非中东地区的社会运动依靠的往往是政治党派内部的社会支持网络。这种社会支持网络极少是等级制的,相反是以水平联系和非正式制度作为组织基础(Clark, 2004b: 26)。在埃及,已建立起分布最广泛、影响最大、联系最紧密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是穆斯林兄弟会(Ehrenfeld, 2011)。通过组建数量众多的伊斯兰社会机构(Islam Social Institutions)提供社会服务,^①穆斯林兄弟会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Bayat, 2000; Wiktorowicz, 2001; Clark, 2004a, 2004b)。^②为了与穆斯林兄弟会进行竞争,无论是埃及政府还是其他世俗政治力量或伊斯兰反对派,都竞相通过提供社会服务以拓展自己的政治基础、组建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Bayat, 2000: 16)。在“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中,这些社会支持网络均发挥了重要动员作用。然而,鉴于这两次社会运动的反对派联盟并没有大的出入,而且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其社会支持网络不会出现显而易见的扩展,因此可以判断,社会支持网络本身也不是导致这两次社会运动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① 这些服务机构尽管被冠以“伊斯兰”的名字,但实际上无论是从组织结构、运行规则或功能上都与伊斯兰事业没有实质关系。之所以被称为“伊斯兰社会机构”,只是因为慈善服务的提供者信仰伊斯兰事业而已(Clark, 2004b: 39; Wiktorowicz, 2001: 65, 67)。

② 学者对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的这些机构有不同的称呼,例如“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伊斯兰自愿协会”、“私人资源协会”等等(Clark, 2004b: 163)。

最后看虚拟社交网络。博客、Twitter、Facebook、YouTube、Myspace等虚拟社交网络属于典型的水平网络,其结构是以水平化、多元化、互动性、即时性为特征的。具有这些结构特征的虚拟社交空间的确能促进政治动员,有助于社会运动的出现。埃及社会运动同样充分利用了这些虚拟社交网络进行政治动员(Faris, 2010: 35)。上文对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了简要介绍,这里着重讨论它在“受够了”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受够了”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虚拟社交网络是博客。博客大约在2003年至2004年间出现在埃及,到2005年,埃及博客空间的发展已趋成熟(Isherwood, 2008: 3; Radsch, 2008: 17)。可以说,埃及的第一代博主与“受够了”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因为“撇开‘受够了’运动很难解释博客在埃及的起源,但撇开博客又很难解释‘受够了’运动的成功”(Isherwood, 2008: 3)。自2005年2月开始,“受够了”运动的许多支持者就使用博客进行政治动员,参与其中的“青年变革运动”运动组织最为积极。在“受够了”运动期间,无论是在咖啡馆、大学礼堂,还是正在抗议的街上,博主们都随身携带着手提电脑,随时对博客进行更新。他们的帖子多是揭露警察与安全机构对待抗议者的粗暴态度,传递社会抗议的最新进展(Isherwood, 2008: 3-4; Fahmi, 2009: 96-97)。信息的及时沟通和对警察滥用暴力的披露,不仅吸引了许多同情者参与到“受够了”运动中来,而且还影响到国际主流媒体对“受够了”运动的报道(Oweidat et al., 2008: 22-24)。但因为“青年变革运动”组织与“埃及变革运动”组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识形态鸿沟,博主们后来逐渐撤出了“受够了”运动(Fahmi, 2009: 97-98)。到2006年12月,“受够了”运动已没有什么影响。真正对“受够了”构成致命打击的是2007年,因为在这一年,博主们彻底地退出了“受够了”运动(Radsch, 2008: 8; Lerner, 2010: 568-570)。^①随着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的兴起,它们同样被埃及抗议者运用到社会运动中来(Al Ezzi et al., 2008)。2011年,正是通过充分发挥虚拟社交网络的动员作用,抗议者成功地拉开了“一二五”运动的序幕。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都借助了虚拟社交网络的动员优势,所

① 值得强调的是,博主们的退出并不是导致“受够了”运动衰落的直接原因,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五部分进行分析。

以这也非导致这两次运动出现不同结果的关键原因。^①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发现,政治过程模式与资源动员理论虽然对我们理解埃及社会运动有重要启发,但它们本身无法解释在共享了如此多结构特征与资源基础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两次社会运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政治效应。笔者认为,动员能力的不同是回答这一困惑的最佳答案。我们已经提到,军队的中立尽管是“一二五”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这一因素本身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在“受够了”运动期间,埃及政府没有调集军队来应对局势。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局面,是因为两次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不同。“埃及变革运动”组织领导人为“受够了”运动制定的动员目标是10万人,然而即使在“受够了”运动的全盛期,其动员起来的抗议者最多不超过2500人(往往少于1000人),而且抗议者经常是一些老面孔(El-Mahdi, 2009: 1027)。与此同时,由另一个抗议组织——“全国变革与改革联盟”——组织发起的抗议活动有两次分别动员了5000名与7000名抗议者(见表1)。即使将两个组织动员起来的抗议者相加,这一数字也仅为1万人左右,其动员能力远未达到“埃及变革运动”组织领导人所设定的目标。尽管目前在“一二五”运动的单场抗议活动最多动员了多少人的问题上缺乏明确的统计数据,但具体一天的最高动员人数分别是2月1日的100万或25万,2月11日的100余万;而聚集在解放广场的抗议者达到10余万的报道在“一二五”运动期间常见报端(见表2)。^② 仅此一项,就可以发现“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在动员能力上存在的显著差别。这种能力上的差异,能够对“一二五”运动中

① 或许有反驳意见指出,Facebook、Twitter、YouTube、Myspace等新的虚拟社交网站与博客在动员能力上的差异是说明“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取得不同结果的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受够了”运动使用的社交网络主要是博客,当时Facebook等社交网站尚未出现。然而,这一质疑并不能构成对笔者观点的否定。如果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的使用是决定性的解释因素,那么顺乎逻辑的推论是假如没有这些社交网络,“一二五”运动将会失败。然而,事实却刚好相反。自2011年1月28日开始,埃及政府就切断了因特网服务,直到2月2日才恢复。在此期间仍有大批群众聚集在解放广场进行抗议,2月1日抗议群众的规模甚至达到了高潮。由此可见,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站的使用在运动初期发挥的动员作用是显著的,但并不是运动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② 面对数量接近百万的抗议群众,军队根本就不敢使用武力进行镇压,因为一旦使用武力,带来的只能是一场屠杀。对军队指挥官来说,这种事态是无法接受也无力承担的。更何况埃及军方在“一二五”运动之前就已经积累了比较良好的声誉(Karawan, 2011: 45、48),军队指挥官更不敢拿这种声誉当儿戏。相反,“受够了”运动因为没有动员起足够数量的抗议群众,穆巴拉克政府甚至无需调集军队就足以应付局势。

军队保持中立、而在“受够了”运动中埃及政府甚至没有动员军队做出合理的说明。

如果动员能力的差异是导致两次社会运动产生不同结局的决定因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面临相似政治机会与动员了同样的水平网络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两次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为什么是2011年而不是2005年”这一困惑。

五、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架构与架构共鸣

为什么“受够了”运动的动员能力要远远小于“一二五”动员能力?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架构视角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发。架构视角最初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于1974年提出(Goffman, 197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戴维·A.斯诺与罗伯特·D.本福德等人引入社会运动的分析中(Snow et al., 1986; 斯诺、本福德, 2002; Benford & Snow, 2000)。集体行动中的架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但它们最主要的功能有两个:指出能有效汇聚抗议者及潜在参与者的具体社会问题;就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采取的运动提供针对性的建议。架构的这两种主要功能,分别被斯诺与本福德称为“诊断式架构”(diagnostic frame)与“处方式架构”(prognostic frame)(斯诺、本福德, 2002: 156-157)。

架构视角提倡者认为,架构构成的话语体系可以为社会运动提供合法性。不过,社会运动的架构首先是行动导向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话语体系。在社会运动中,不同的社会运动组织或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架构,这些架构可以实现架构结盟(frame align),从而在社会运动浪潮中形成一种“主架构”(main frame)(斯诺、本福德, 2002);但因为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有所不同,社会运动组织之间可以建构出不同的诊断式架构与处方式架构,从而在运动之中出现架构竞争(frame contest);反对者则可以提出自己的反架构(counter frame),以削弱社会运动的合法性(Benford & Snow, 2000: 537-538)。

社会运动架构能否成功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社会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主架构能否与潜在参与者产生“架构共鸣”(frame resonance)。所

谓“架构共鸣”是指社会运动领导者或其支持者就某一社会问题做出的诊断及提供的解决方案,能否得到其他潜在抗议者的支持和认可(Benford & Snow, 2000: 530)。在斯诺与本福德看来,影响架构共鸣成败与程度的因素主要有两组:一组是架构的可信性,一组是架构的相对显著性。架构可信性包括三个因素:架构持续性(frame consistency)、经验可信性(empirical credibility),以及架构提出者本身的可信性(credibility of the frame articulator)。架构显著性同样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架构的集中性(centrality)、经验可通约性(experience commensurability),以及描述的精确性(narrative fidelity)(Benford & Snow, 2000: 530-533)。尽管上述影响架构共鸣的因素与社会运动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全部得到社会运动经验研究成果的证实,但斯诺与本福德提出的上述分析框架能解释为什么埃及“受够了”与“一二五”运动在动员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

“受够了”与“一二五”运动都提出了自己的集体行动架构。如前所述,“受够了”运动之所以得名,就在于它响亮地喊出了“受够了”的口号。“受够了”的涵义在于认为埃及人已不需要穆巴拉克担任总统,更不需要穆巴拉克的儿子来继续其家族统治。“受够了”的口号在埃及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这也是该运动从2004年底一直持续到2007年下半年的重要原因。诚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当“受够了”运动的架构不仅要求穆巴拉克不要寻求新的总统任期,而且把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也纳入“受够了”架构中来时,这种架构就体现出了能与某些埃及民众产生架构共鸣的能力。这是因为“将政治参与的诉求与存在更广泛听众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关联了起来,这在作为一个后殖民主义国家的埃及存在深层根源,这是一种以新的方式解释政治参与及其重要性的文化架构过程……通过把埃及本国的事业联系起来从而给‘抵抗’与‘斗争’赋予新的含义,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仅仅对文化架构做了贡献,而且通过产生出来的吸引力与怨恨的程度,这一文化架构为更广泛的埃及大众,尤其是向学生,提供了一个通过示威活动、校园活动、以色列抵制活动等途径表达对当局不满的机遇”(El-Mahdi, 2009: 1024-1025)。

在“受够了”运动中,运动领导者提出的诊断式架构与处方式架构是同一的:埃及国家与社会的众多问题均来自于穆巴拉克的统治,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穆巴拉克不寻求新的总统任期、不将其总统职

位传给其子才能实现。在“受够了”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看来,“受够了”这一架构准确地说明了埃及各种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途径,而且这一口号也与他们艰辛的生活体验以及对以色列的不信任相契合,所以该架构显示出一定的吸引力。

构成“一二五”运动的主架构是“下台”。为了让“下台”的主架构取得更大程度的架构共鸣,抗议者使用了许多契合埃及传统文化的架构建构方式。例如,参与“一二五”运动的埃及说唱歌手群体就创造了许多琅琅上口极易传唱的歌谣(如“穆巴拉克,是厚脸皮;滚蛋滚蛋,你这硕鼠”),对穆巴拉克极尽讽刺之能事。不仅如此,这些说唱歌手还结合埃及的一种民俗音乐(Baladi音乐),并采用诗歌朗诵、肖像悬吊等玩世不恭、低俗粗糙但富含政治意蕴的方式传递政治信息,致力于羞辱穆巴拉克。这些架构建构方式旨在削弱穆巴拉克政府的合法性、驱赶对政府镇压的恐惧(Creswell, 2011; Kessler & Lidman, 2011)。事实证明,这些架构建构方式有效地帮助抗议者们克服了对参与社会运动的恐惧,同时树立起了有关运动能迫使穆巴拉克下台的信心。如有的抗议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们的心智已经有所改变。他们觉得自己很神圣。他们不再害怕。我们不再害怕这种体制,因为我们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停止恐惧……我们敢于说出总统的错误、政府的无能。这是我们国家的一次革命,我们思维方面的一次革命。穆巴拉克也许能继续呆上几天或几个星期,但他不能阻止这场革命。我们不会回家”(Bengali & Allam, 2011)。从这里可以发现,架构共鸣能够证实本福德与斯诺的观点,架构具有为社会运动赋予合法性,并凝聚运动参与者对运动原因、运动目的等方面共识的功能。

“受够了”与“一二五”运动主架构的内容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而且都面临外部反架构的挑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它们在动员民众参与的规模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受够了”提出的“受够了”架构,与“一二五”运动提出的“下台”架构之间,除了前者更强调架构的诊断性特征而后者强调架构的处方式特征外,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区别。无论是“受够了”还是“下台”,都在埃及社会中引起了认同与共鸣。在面临的外部架构挑战方面,为了对社会运动进行“去动员”(demobilize),穆巴拉克政府在这两次社会运动中都针锋相对地建构了

一些反架构^①而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②因此,埃及政府建构的反架构对社会运动的后果的影响,并不是导致两次社会运动动员能力大小出现明显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既然如此,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转移到影响架构共鸣的六个因素——架构的持续性、经验可信性、架构提出者本身的可信性、架构的集中性、经验可通约性以及描述的精确性——上来。然而在这六个方面中,除了架构的集中性与经验可通约性,影响这两次社会运动架构共鸣的其他四个方面的因素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埃及两次社会运动架构的集中性与经验可通约性,决定了“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动员能力的不同。事实是否如此呢?

首先来看“受够了”在架构集中性与经验可通约性方面的特征。在架构集中性方面,“受够了”运动存在严重问题。“受够了”运动虽然组建了世俗力量与伊斯兰政治力量之间的松散联盟,但这些力量对于诊断性架构、处方架构的理解和主张有所不同,从而在社会运动内部产生了分化。“受够了”运动的架构致力于在实现穆巴拉克不再寻求任期的基础上增强民众的政治参与,其实质是追求“自由”与“民主”。但是,对于如何理解这些核心概念,世俗派与伊斯兰力量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以“埃及变革运动”组织为首的世俗派指责以穆斯林兄弟会为首的伊斯兰政治力量对民主的理解存在缺陷,认为伊斯兰力量将西方式的自由等同于堕落与不道德有失偏颇;而伊斯兰力量则控诉世俗派在如何对待宗教自由的问题上态度模糊,认为后者采取这种策略是阻止伊斯兰政治力量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并阻止伊斯兰政治力量劫持“受够了”运动的成果(Oweidat et al., 2008: 38-39)。不仅如此,“受

① 穆巴拉克政府建立的反架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反架构认为穆巴拉克才是实现埃及稳定与安全的保障,而穆巴拉克的下台则意味着埃及将步入骚乱的深渊,带来的只会是“骚乱与烈火”(Witte, 2011; Contenta, 2011; Hoffman, 2011)。第二类反架构认为抗议者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贯彻的是外部势力——潜台词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命令。第三类反架构的主要观点是民主制度的建设需要顾及到埃及的实际情况,而通过发动抗议、示威等方式来激进地推进民主,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比如劫掠活动的产生。然而,为了安抚抗议者,这类反架构承诺进行必要的改革,但同时强调这种改革必须逐步加以推进,以避免混乱局面的产生。

② 如第二类反架构在“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受够了”运动期间,埃及政府针对“埃及变革运动”组织提出了指控,称其接受了中央情报局资助,导致该组织的领导人不得不就与西方的关系做出澄清,并拉开与西方的距离(参考 Oweidat et al., 2008: 32, 40);在“一二五”运动中,埃及政府有关抗议者受到外部势力教唆和操纵的反架构,让某些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和底层民众怀疑抗议者的动机,详见下文。

够了”运动还将自己的架构拓展到埃及的一些外交政策和内部问题上,这不但进一步模糊了“受够了”运动的主旨,而且还深化了世俗派与伊斯兰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如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受够了”运动在要不要采取“反美”与“反以”立场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在国内问题上,世俗派与伊斯兰政治力量又在关于是否支持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Oweidat et al., 2008: 32 - 35)。

由此可见,尽管“受够了”运动喊出的口号看似有明确的诉求,即要求穆巴拉克不要继续下一任期和将总统之位传给其子,但又在不经意间将架构拓展到了许多容易引起争议的社会与外交政策问题上。“受够了”运动构建的架构过于宽泛,不仅让潜在的参与者与旁观者对运动的主旨产生困惑,从而削弱了运动的动员能力,更严重的是,它给运动的内部团结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导致参与“受够了”运动的各政治力量发生内讧。“受够了”运动架构的分化是斯诺与本福德意义上的“架构拓展”(frame extension),但这种架构拓展导致“受够了”运动的动员能力不足,最终令迫使穆巴拉克下台的预期目标无法实现(Snow et al., 1986: 472 - 473)。

再来看“受够了”运动的经验可通约性。在总结“受够了”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教训时,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该运动未能充分吸引大众支持和参与的缺陷。“受够了”运动以民主和自由为诉求的架构虽然对中产阶级有一定吸引力,但当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将许多精力投入到抽象的民主概念的讨论时,却疏远了许多埃及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具体而言,架构拓展疏远了两类民众群体:首先是各政治派别的社会支持网络。如“青年变革”组织对“埃及变革运动”组织抽象地谈论民主、自由与人权极为不满,为此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架构——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将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与政府联系起来,向人们解释他们享有特定的权利,而某些人则有责任倾听他们的呼声”(Fahmi, 2009: 97 - 98)。为此,该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博主们,积极呼吁运动关注穷人、无家可归者与失业者们面临的生活困境,从而与“埃及变革运动”组织构建的架构形成架构竞争。如此一来,参与者之间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受够了”运动的动员能力。其次,疏远了下层民众,这是更为致命的问题。由于“受够了”运动的主架构抽象地谈论政治问题,忽视将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诉求——就业、提高生活水平、稳定物价等——与社会运动衔接起来,下层群众对“受够了”运动的架

构表示冷漠,这是“受够了”运动的动员能力从未超过 10000 人的直接原因(Oweidat et al., 2008: 38 - 39; El-Mahdi, 2009: 1031 - 1032; Peretz, 2011: 9)。总之,“受够了”运动的架构在集中性与经验可通约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带来了参与者的内部分裂,而且严重影响到架构共鸣程度,进而使其未能实现迫使穆巴拉克下台的目标。

“一二五”运动的架构在集中性与经验可通约性方面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呢?先看集中性。作为“一二五”运动主架构的是“下台”,这一口号在“一二五”运动中喊得最为响亮,而且从 1 月 25 日一直喊到 2 月 11 日穆巴拉克黯然辞职。即使在 2 月 1 日穆巴拉克宣布不再参加预定于 9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后,这一口号仍然响彻开罗解放广场。由此可见,在“一二五”运动中,社会运动的领导者与参与者都明确将运动目标锁定在穆巴拉克辞职这一问题上。尽管在运动中抗议者也提出了许多别的政治诉求,如呼吁出台新的宪法、解散埃及政治党——国家民主党、审判穆巴拉克及其下属等,而且同时也喊出了别的口号,如“穆巴拉克是盗贼”、“穆巴拉克是胆小鬼”等,但“下台”无疑是抗议者发出的最明确的政治信息和压倒性的呼声(Shadid, 2011; Mcgrath, 2011)。抗议者的共识是:穆巴拉克 30 年的非正义统治已经足够,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由他继续执政 8 个月(即到 2011 年 9 月举行新的总统大选)(Chick, 2011)。在这种共识下,那些曾经导致“受够了”运动架构分散化的议题,在“一二五”运动中没有重新出现。如没有出现明显的“反美”或“反以”口号,伊斯兰议题同样没有成为领导者与抗议者们争论的焦点。^①“一二五”运动架构的高度集中性,至少有两个积极后果:首先,暂时拆除了那些引发各政治派别和不同政治倾向的参与者之间发生内讧和争端的导火线;其次,维护了各种水平网络及抗议者之间的团结,激发更多的民众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参与社会运动。

就架构的经验可通约性而言,“一二五”运动的主架构克服了“受够了”主架构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二五”运动导火线的赛伊德事件,之所以引发了埃及民众尤其是网民们的众多关注,主要是因为赛伊德不属于埃及任何政治派别,只是一名纯粹的老百姓。他的悲惨遭遇让

^① 事实上,反美、反以口号的缺失与伊斯兰色彩的淡化,构成了“一二五”运动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Haseeb, 2011: 116、117; Joshi, 2011: 65; Bengali & Allam, 2011; Gerstler-Holton, 2011)。

同样生活艰辛、饱受官员腐败和安全机构滥用暴力之苦的埃及民众产生了强烈共鸣。当参与者在赛伊德事件的基础上建构出相应的诊断式架构(产生诸如此类事件的根源在于穆巴拉克政府)和处方式架构(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在于穆巴拉克下台)时,普通埃及人对此产生了高度的认同。除了赛伊德事件引发的共鸣外,抗议参与者抱怨的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困难,如失业、物价飞涨、工资待遇低下、食品缺乏等经济问题,人身安全受到安全机构威胁等社会问题和没有政治自由等政治问题;而“下台”主架构的观点与此相呼应,顺应并契合了民众的这些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二五”运动建构出来的架构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很多报道和研究都注意到“一二五”运动实现了跨阶层的动员,其参与者包括许多中产阶级,以及工人、妇女、孩子、农民等弱势群体,甚至还有一些上层人士(Shadid, 2011; Murdock, 2011; Bengali & Allam, 2011; Pendlebury, 2011)。“一二五”运动能够动员近100万左右的抗议者,证明了架构的集中性、经验可持续性对于架构共鸣、进而对社会运动成功的重要性。至此,我们能就埃及2005年与2011年的两次社会运动为什么产生了不同的动员能力得出结论,那就是社会运动架构在架构集中性与经验可通约性方面存在差异。

六、讨论及展望

我们发现,“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在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与动员起来的资源(主要是水平网络)方面,并未出现明显的差异。动员能力的差异才是导致两次社会运动产生不同结果的直接原因,而社会运动架构的集中性与经验可通约性则是影响埃及社会运动动员能力的关键因素。“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提出了类似的架构,而且都面临埃及政府建构的反架构的挑战,甚至在影响架构共鸣程度的因素上有四个方面——架构持续性、经验可信性、架构提出者本身的可信性、描述的精确性——近似,但由于在集中性与经验可通约性方面有所差异,所以导致这两次社会运动产生了不同的动员能力,从而带来了不同的政治后果。表4列出了本文的解释逻辑,以及影响“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动员能力之因素间的异同。

表 4 本文的解释逻辑及“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的异同

自变量		中间变量 (动员能力)	因变量 (政治效应)	
政治机会结构	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	近乎相同	显著差异	
	精英内部的团结程度			
	外部行为体的影响			
	国家进行镇压的意愿			
动员资源 (水平网络)	反对派联盟			
	社会支持网络			
	虚拟社交网络			
影响架构共鸣的因素	架构的可信性			架构持续性
				经验可信性
				架构提出者的可信性
	架构的相对显著性	描述的精确性		
		架构的集中性	显著差异	
		经验可通约性		

对于本研究来说,仍有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

首先,本文主要是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角度来对“受够了”与“一二五”运动出现不同政治后果的原因进行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其他因素在这一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我们在文中提到2008年以来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Facebook与Twitter等新出现的虚拟社交网络、突尼斯运动成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等因素,甚至“一二五”运动参与者与组织者从“受够了”运动失败中汲取到的经验教训、其后5、6年来埃及社会矛盾的积累等,都是影响“一二五”运动而“受够了”运动所缺失的因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因素是否才是决定这两次社会运动取得不同结果的原因。我们力图说明的是:它们尽管对“一二五”运动的出现或取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本身并不是这两次运动产生不同后果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不过仍需指出,如果不是进行比较研究,这些未在“受够了”运动中出现但影响到“一二五”运动动员能力的因素,其重要性应予以强调。

其次,斯诺与本福德的架构解释框架也有待完善。本福德与斯诺认为六种因素能够影响架构共鸣,但他们只是定性地提出了这些假设,既未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架构共鸣的具体机制做出充分阐释,也未明

确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这些不足同样影响到本文对埃及社会运动的解释。例如,我们不清楚在共享其他四个方面特性的条件下,为什么架构的集中性与经验的可通约性对架构共鸣的程度能产生显著的影响?此外,在构成埃及社会运动动员基础的水平网络方面,无论是反对派联盟、社会支持网络、还是虚拟社交网络都是以水平化为特征的。然而,至少在“一二五”运动中,抗议者与支持者有效地克服了水平网络的破碎化,保持了联盟和抗议者间的团结。毫无疑问,架构共鸣有助于这种团结的产生,但无论架构的集中性还是经验可持续性,似乎都不足以充分说明团结为什么得以维持。斯诺与本福德曾经提到过的“集体身份”为说明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Benford & Snow, 2000: 631 - 632),然而,集体身份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行为体之间的同质性。^①在埃及水平网络具有显而易见的异质性这一背景下,集体身份的概念及其运作机制能在多大程度对此作出说明,仍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有待探讨的是:用以解释埃及社会运动成败的因素,是否同样能解释其他北非中东国家的社会运动。在未对同样发生社会运动的其他北非中东国家与埃及进行比较研究之前,笔者不敢妄言。但既然这些国家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有相似性,而且地理位置相邻,那么本文的研究或许能为探索不同国家社会运动之所以出现不同结果给出些许提示。当然,既然带来了不同的结果,至少说明其他国家的社会运动可能有某些特殊的发展动力和机制。这些动力与机制究竟是什么,有赖于学界开展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蒂利,查尔斯·西德尼·塔罗 2010,《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何志龙 2006,《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大中东计划”》,《现代国际关系》第6期。
贺文萍 2011,《民生凋敝是中东动荡的主因》,《社会观察》第3期。
胡雨 2009,《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政治伊斯兰生成机制》,《国际论坛》第3期。
黄冬娅 2011,《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第2期。
凯克,玛格丽特·E.、凯瑟琳·辛金克 2005,《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韩

① 尽管许多社会理论家和社会运动研究者都谈到了集体身份形成的条件,但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有关集体身份形成条件的讨论是比较全面和深刻的。温特认为,集体身份的产生需要四个条件,即共同命运、相互依赖、同质性与自我克制(温特 2000: 430 - 454)。

- 召颖、孙英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乐颖 2011,《论“埃及事件”的特点及成因》,《亚非纵横》第2期。
- 麦克亚当 道格、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 2006,《斗争的动力》,李义中、屈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莫里斯·艾尔东、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 2002,《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倪云鸽、胡雨 2009,《试析当代政治伊斯兰的生成机制——一种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
- 牛新春 2011,《美国中东政策:矛盾与困境》,《外交评论》第2期。
- 裴宜理、阎小骏 2006,《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4期。
- 秦天 2011,《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前因后果》,《国际资料信息》第2期。
- 邵峰 2004,《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实质和发展前景》,《亚非纵横》第4期。
- 斯诺 戴维·A.、罗伯特·D.本福德 2002,《“主框架”和抗议周期》,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孙溯源 2011,《中东北非变局与西方石油安全的悖论——兼论中国的石油安全》,《外交评论》第2期。
- 田文林 2011,《对当前阿拉伯国家变局的深度解读》,《现代国际关系》第3期。
- 王鸿刚 2004,《美国“大中东计划”简介》,《国际资料信息》第4期。
- 王锁芳 2011,《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几个问题》,《外交评论》第2期。
- 温特·亚历山大 2000,《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杨阳 2011,《中东变局对以色列安全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第3期。
- 叶青 2005,《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困境——试析美国的大中东计划》,《阿拉伯世界》第5期。
- 张维为 2011,《浪漫“革命”之后:埃及困境如何破解》,《社会观察》第3期。
- 赵鼎新 2006a,《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6b,《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学海》第2期。
- Abdelrahman, Maha 2009, “‘With the Islamists? Sometimes. With the State? Nev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eft and Islamists in Egypt.”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6(1).
- Al Ezzi, Mustafa, Marwan H. El-Sheikh, Dalia M. Hamdy, Mahitab K. Eldin & Sherine A. Mahfouz 2008, “Cyber Activism in Egypt through Facebook.” Paper Presented to IAMCR 2008-JRE Section.
- Avenim, Adrian 1978, “Organizational Linkages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Linkage Strength and Breadt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2).
- Bayat, Asef 2000, “Social Movements, Activ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gramme Paper Number 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 2005, “Islamism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6(6).
- 2007, *Making Islam Democratic: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st-Islamist Tur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inin, Joel 2009, “Worker’s Protest in Egypt: Neo-Liber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21st Centu-

- ry. ” *Social Movements Studies* 8(4) .
- Bengali , Shashank & Hannah Allam 2011, “Mubarak Refuses to Heed the Call. ” *Sunday Telegraph (Australia)* , February 6.
- Benford , Robert D. & David A. Snow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 Bornstein , David 2007 ,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the Power of New Ide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khars , Anouar 2011, “The Arab Revolutions for Dignity.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 33.
- Boykoff , Jules 2006 , *The Suppression of Dissent: How the State and Mass Media Squelch US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 Byman , Danie 2011a, “Terrorism after the Revolution. ” *Foreign Affairs* 90(3) .
- 2011b, “Israel’s Pessimistic View of the Arab Spring.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4(3) .
- Chick , Kristen 2011, “Unmoved by Mubarak ’ s Speech , Egyptian Protests Insist ‘He Must Leave’ . ”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February 1.
- Clark , Janine A. 2004a,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Patron-Clientalism: Islamic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Egypt , Jordan , and Yemen.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7 (8) .
- 2004b , *Islam , Charity , and Activism: Middle-Class Welfare in Egypt , Jordan , and Ye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ontenta , Sandro 2011, “Egyptians Battle for Heart of Cairo. ” *The Toronto Star* , February 3.
- Creswell , Robyn 2011, “Egypt: The Culture Revolution. ”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 February 20.
- Cunningham , David 2004 ,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Here: The New Left , the Klan , and FBI Counterintellig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venport , Christian , Hank Johnston & Carol Mueller (eds.) 2005 , *Repression and Mobi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ella Porta , Donatella & Herbert Reiter (eds.) 1998 , *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iani , Mario 2008,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Grassroots Coal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 ASA Meeting , Boston.
- Doran , Michael S. 2011, “The Heirs of Nasser. ” *Foreign Affairs* 90(3) .
- Dorell , Oren & Alice Fordham 2011, “Fury Grows in Egypt , Mubarak’s Moves Set Stage for Conflict. ” *USA Today* , February 11.
- Eckstein , Harry 1965, “On the Etiology of Internal Wars. ” *History and Theory* 4(2) .
- Editor 2011,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 *Commonweal* , March 25.
- Ehrenfeld , Rachel 2011, “The Muslim Brotherhood Evolution: An Overview.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33(2) .
- El-Mahdi , Rabab 2009, “Enough! Egypt’s Quest for Democracy.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8) .

- Fahmi ,Wael Salah 2009, “Bloggers’ Street Movement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Re) claiming Cairo’s Real and Virtual ‘Spaces of Freedom’ .”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1(1) .
- Fakhro ,Elham & Emile Hokayem 2011, “Waking the Arabs.” *Survival* 53(2) .
- Faris ,David 2010, “Revolutions without Revolutionaries? Social Media Networks and Regime Response in Egyp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 D. Dissertation.
- Fisk ,Robert 2011, “They Sang. They Laughed. They Cried. Mubarak Was No more; Here Were Arabs Facing Their Fear to Depose a Man the West Loved.” *The Independent (London)* ,February 12.
- Fleishman ,Jeffrey 2011, “A New Chapter for Egypt ,Egypt is Heard.”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2.
- Freeman ,Chas W. 2011, “The Arab Reawakening: Strategic Implic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18 (2) .
- Ganson ,William A. & David S. Meyer 1996,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Doug MacAdam ,John D. McCarthy &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Ganson ,William ,Bruce Fireman & Steven Rytina 1982 ,*Encounters with Unjust Authority*. Homewood ,IL: Dorsey.
- Gerstler-Holton ,Jordan 2011, “The People against the Police. Egyptians Fight to Get to Tahrir Square.”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3.
-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Robert J. 1983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 Goldston ,Jack A. 2011, “Understanding the Revolutions of 2011.” *Foreign Affairs* 90(3) .
- Haklai ,Oden 2009, “Authoritarianism and Islamic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Theory-Build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1(1) .
- Hamid ,Shadi 2011, “The Rise of the Islamists.” *Foreign Affairs* 90(3) .
- Hardin ,Russell 1982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aseeb ,K. El-Din 2011, “On the Arab ‘Democratic Spring’: Lessons Derived.”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4(2) .
- Hibbs ,Douglas A. , Jr. 1973 ,*Mass Political Violence: A Cross-National Causal Analysis*. New York: Wiley.
- Hoffman ,Gil 2011, “Ben-Eliezer: Mubarak Regime ,Peace Will Endure.”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8.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1 ,*World Economic Outlook—Tensions from the Two-Speed Recovery: Unemployment ,Commodities ,and Capital Flows*. Washington ,D. C. : IMF Multimedia Services Division.
- Indexmundi 2011, “Egypt Unemployment Rate.” (<http://www.indexmundi.com/egypt/unem->

- ployment_rate.html)
- Isherwood, Tom 2008, "A New Direction or More of the Same? Political Blogging in Egypt." *Arab Media and Society* (6).
- Ismail, Amr & Ahmed Adly 2011, "When Cheap is Costly: Rent Decline, Regime Survival and State Reform in Mubarak's Egypt(1990-2009)."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7(2).
- Jennifer, Preston 2011, "Movement Began with Outrage and a Facebook Page That Gave It an Outlet."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5.
- Johnstone, Sarah & Jeffrey Mazo 2011, "Global Warming and the Arab Spring." *Survival* 53(2).
- Joshi, Shashank 2011, "Reflections on the Arab Revolutions: Order, Democracy and Western Policy." *Rusi Journal* 156(2).
- Karawan, Ibrahim A. 2011, "Politics and the Army in Egypt." *Survival* 53(2).
- Kessler, Oren & Melanie Lidman 2011, "Mubarak Says He Won't Run for Re-elect, While Angry Crowds Insist He Should Go Now."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
- Khawaja, Marwan 1993, "Repression and Popular Collective Action: Evidence from the West Bank." *Sociological Forum* 8(1).
- Leadbeater, Charles 1996, *The Rise of the Social Entrepreneur*. London: Demos.
- Lerner, Melissa Y. 2010, "Connecting the Actual with the Virtual: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 in the Muslim World—The Cases of Iran and Egypt."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30(4).
- Leverett, Flynt (ed.) 2005, *The Road Ahead: Middle East Policy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Second Ter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ynch, Marc 2011, "America and Egypt after the Uprisings." *Survival* 53(2).
- McAdam, Doug 1996, "Political Opportunity: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 In Doug MacAdam, John D. McCarthy &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McCarthy, John D. & Mayer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6).
- Macintyre, Donald 2011, "Egypt's Revolution: Will it Run out of Steam?" *The Independent (London)*, February 8.
- Mair, Johanna, Jeffrey Robinson & Kai Hockerts (eds.) 2006,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cgrath, Cam 2011, "A Million Voices, One Message." *Inter Press Service*, February 1.
- Mednicoff, David M. 2003, "Think Locally—Act Globally? Culture Framing and Human Rights Movements in Tunisia and Morocco."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7(3).
- Meyer, David S. 2004, "Prote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 Munson, Ziad 2001, "Islamic Mobilizatio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2(4).
- Murdock, Heather 2011, "Mubarak Backers Join Fray in Egypt; Widespread Clashes Kill 3, Injure

- 1 500. ” *The Washington Times* , February 3.
- Nicholas , Peter & Paul Richter 2011, “Unrest in Egypt: Mubarak Distrust Reform in Mideast. ” *Los Angeles Times* , February 2.
- Oberschall , Anthony 1973 ,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 N. J. : Prentice-Hall.
- Oliver , Pamela 1980, “Rewards and Punishment as Selective Incentives for Collective Action.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 Oweidat , Nadia , Cheryl Benard , Dale Stahl , Walid Kildani , Edward O’Connell & Audra K. Grant 2008 , *The Kefaya Movement: A Case Study of a Grassroots Reform Initiative*. Pittsburgh: Rand Corporation.
- Pendlebury , Richard 2011, “Helicopters , Tanks , a Burst of Gunfire , a Crackdown or False Alarm in Cairo. ” *Daily Mail (London)* , February 7.
- Peretz , Martin 2011, “The New Middle East. ” *The New Republic* , March 3.
- Radsch , Courtney 2008, “Core to Commonplace: The Evolution of Egypt ’ s Blogosphere. ” *Arab Media and Society* (6) .
- Reuters 2011, “18-day Revolution: Jan. 25–Feb. 11. ” *National Post (Canada)* , February 12.
- Shadid , Anthony 2011, “Mubarak Won’t Run Again , but Stays; Obama Urges a Faster Shift of Power. ” *The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
- Sharekh , Alanoud Al 2011, “Reform and Rebirth in the Middle East. ” *Survival* 53(3) .
- Sharp , Jeremy M. 2011 , *Egypt: 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 D. C.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eport 33003) .
- Shehata , Dina 2011, “The Fall of the Pharaoh. ” *Foreign Affairs* 90(3) .
- Shorbagy , Manar 2007a, “Understanding Kefaya: The New Politics in Egypt. ” *Arab Studies Quarterly* 29(1) .
- 2007b, “The 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 — Kefaya: Redefining Politics in Egypt. ” *Public Culture* 19(1) .
- Singerman , Diane 2004, “The Networked World of Islamist Social Movements. ” In Quintan Wiktorowicz (ed.) , *Islamic Activism: A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pproa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ky , Emma 2011, “Arab Spring , American Fall. ”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3(2) .
- Snow , David A. , E. Burke Rochford , Jr. , Steven K. Worden & Robert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 Micromobilization ,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 .
- Snyder , David & Charles Tilly 1972,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 1830 to 1960.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5) .
- Stanley , William 1996 , *The Protection Racket State: Elite Politics , Military Extortion , and Civil War in El Salvado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Taleb , Nassim N. & Mark Blyth 2011, “The Black Swan of Cairo. ” *Foreign Affairs* 90(3) .

- Tarrow ,Sidney 2005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2004, “Foreword.” In Quintan Wiktorowicz (ed.) ,*Islamic Activism: A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pproa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Robert W. 1989, “From Peaceful Protest to Guerrilla War: Micromobilization of the 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6) .
- Wickham ,Carrie R. 2002 ,*Mobilizing Islam: Religion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ktorowicz ,Quintan 2001 ,*The Management of Islamic Activism: Salafi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State Power in Jord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ed.) 2004a ,*Islamic Activism: A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pproa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004b, “Introduction: Islamic Activism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 In Quintan Wiktorowicz (ed.) ,*Islamic Activism: A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pproa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itte ,Griff 2011, “Leaders Backer ,Rich and Poor ,See Much to Lose.” *The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3.
- Wolff ,Sarah 2009, “Constraints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Egypt: Insights from the 2005 Judges’ Revolt.” *Democratization* 16(1) .

作者单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周明)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曾向红)
 责任编辑: 杨 可

PAPER

Opportunity Structures , Horizontal Networks and Frame Resonances in Egyptian Social Movements *Zhou Ming & Zeng Xianghong* 1

Abstract: This paper stems from a puzzle: why the two large-scale social movements in Egypt in 2005 and 2011 (namely the “Enough” movement and the “January 25th” movement) that aiming at bringing the Mubarak regime down have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Using social movement theory , this paper has found that these two social movements faced similar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mobilized the same horizontal social networks; however , the frames appeared in these social movements had produced different frame resonances. Thereby , these differences influenced their respective mobilization capabilities , which led to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Social Class and Local Congressional Election in Urban China
 *Liu Xin & Zhu Yan* 34

Abstract: Departing from literature emphasiz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political efficacy in understanding voting behavior in China’s local congressional election , the authors propose to explain voting behavior from the logic of class politics.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lass politics argues that class position influences voting through class interest , while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class politic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lass identification as a mediator between class position and voting. Hypotheses derived from both explanations are well supported by statistical findings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06 , calculat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test of coefficient difference across regression models. Compared to working class , the middle classes , old or new , are more likely to vote. This is further ex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enjoy higher income and stronger subjective identification as middle class. The higher income also leads to stronger middle class identification , thus stronger inclination to vote. Integrating the rational choice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ies , the authors extend the explanation of class politics and conclude that class interest not only functions as the mediation linking